

符号学研究

特邀主持人: 赵毅衡(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符号是用来承载意义的,符号可被定义为“携带着意义的感知”。不用符号,意义无法生成、传播、解释,因此符号学就是意义学。就这个理论出发点而言,有关意义的一切活动,用符号学审视,都有可能打开一个新的局面。而任何文化,都是与社会相关的符号意义活动的总集合,因此,符号学的主要用武之地,就是文化研究。

这种领域之一,就是修辞。在本栏目中,我们选刊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彭佳和汤黎的论文《转喻作为自然修辞的基本符号机制: 从语言媒介到视觉媒介》,重点讨论的是图像符号的修辞特征,为此她们提出了“自然修辞”这个概念。视觉修辞基于目击的自然现象,“外应物象”,因此其修辞规律,往往应和了自然界的种种变迁。另一篇文章是贾佳的《“谎言”的述真与辨伪——一个符号学命题》,这篇文章探讨了符号修辞学的根本目的问题,即修辞如何取得效果,以及这种效果与意图之间的复杂关系。归根结底,为何听者必然会追究一篇符号文本背后的“真知”? 因为谎言不是“虚构”,而是一种“纪实文体”。明白了谎言的机制,才能明白如何获得“真知”。既然如此,修辞本身并不是中立的,而是在积极干预社会生活。

本栏目还刊登了本人的一篇文章,纪念河北籍的著名教授李安宅先生,以及他的《意义学》一书。此书出版于 1934 年,是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中国唯一的一本讨论符号及其意义的著作。今年正值李安宅先生 120 年双甲子诞辰,谨以此文纪念符号学学科在中国的先行者。

李安宅与中国最早的符号学著作《意义学》

赵毅衡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摘 要: 李安宅是中国符号学的前驱人物,河北迁西人,年轻时执教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是中国人类学研究的开创者,藏学的奠基者之一。1930 年英国学者瑞恰慈来清华大学与燕京大学讲学并研究孟子学说,他与费孝通作为助手参与,由此接触到欧洲的符号研究,写出了《意义学》这本书。这是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中国唯一的符号学著作,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关键词: 李安宅 《意义学》; 符号学

中图分类号: B1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5587(2020) 05 - 0001 - 05

DOI: 10. 13763/j. cnki. jhebnu. psse. 2020. 05. 001

收稿日期: 2020 - 05 - 05

基金项目: 四川大学双一流学科群项目

作者简介: 赵毅衡(1943—),男,广西桂林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符号学 - 传媒学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符号学研究。

李安宅(1900-1985年)先生,中国社会人类学研究的创始人之一,国内藏学的奠基者。但很少有人知道,他也是中国符号学研究的先行者,是现代中国最早的一本讨论符号意义活动规律的书《意义学》的作者。李安宅先生实际上是四川几所主要大学(四川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四川师范大学)的创校元老。今年是李安宅先生120年双甲子生辰,谨以此文纪念这位几乎被人忘却的中国学术先驱者。

李安宅是河北迁西人,1923年就读于齐鲁大学文学系,1926年起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助教。在这个阶段他开始了中国典籍的现代解读工作,名著《〈仪礼〉与〈礼记〉的社会学研究》出版于1931年。而当时,另外一位学者也在做类似的工作,用英语辨义中国经籍概念,那就是应邀到清华大学(1930年春季)与燕京大学(1930年秋季)任教的著名英国理论家、“新批评”的奠基人之一瑞恰慈(I. A. Richards, 李安宅书中译为“吕嘉慈”)。据李安宅介绍,他在燕京大学开两门课“意义的逻辑”与“文艺批评”。实际上他到中国来不仅是教书,更是准备他关于中国意义哲学的著作《孟子论心》。

对一个不懂汉语,更不懂中国古籍的西方人,这个仔细辨析中国哲学的工作,恐怕胆子太大。但是不久(1932年)他就在英国出版了《孟子论心:复合定义实验》(*Mencius on Mind: Experiments in Multiple Definition*)一书,逐句翻译《孟子》的主要章节,并讨论“心”“性”等在西语中非常难说清楚的术语,以及在不同语境中意义的变化。此书可以说是最早对中国经典进行细读,并且概念辨析成功的书。可以想象,这本书的写作,需要中国助手帮助,当时担任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编译员”的青年学者李安宅,以及当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费孝通,被聘请担任这个工作。瑞恰慈在《孟子论心》的扉页上,有对这二位中国青年学人的致谢。

从此后的结果看来,李安宅与费孝通的协助,引向了双赢的局面。瑞恰慈大有所得,前面已经说过;李安宅通过这次合作,熟读了瑞恰慈和其他几位欧洲学者的理论,写出了几本书,其中之一即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的《意义学》。这本书现在已经绝版,李安宅一生著作等身,大

部分书都再版过,这本书只有1943年迁到陪都重庆的商务印书馆重印过一个“渝版”,1991年他去世后出版的《李安宅社会学遗著选》中作为《语言、意义、美学》的一部分出版。现在几乎不为人知,连从事意义理论研究的学者也不太知道,故笔者著此文,以弥补学术史上的遗珠之憾。知者甚少的重要原因是李安宅一生学术主攻方向为社会人类学,尤其是藏学,没有在这方向上继续探研。但是,从《意义学》书中不断提到的人类学著作来看,符号意义问题的研究对他的学术生涯大有帮助。

“符号学”这个中文词,是赵元任在1926年一篇题为“符号学大纲”的长文中提出来的。赵先生写到“符号这东西是很老的了,但拿一切的符号当一种题目来研究它的种种性质跟用法的原则,这事情还没有人做过。”^{[1](P178)}不仅在中国没人做过,在世界上也没有人做过。在20世纪20年代,国际学术界的交流还很不发达。索绪尔提出 *semiology*,到30年代才有布拉格学派穆卡洛夫斯基等人的响应。皮尔斯的 *semiotics* 学说,要到30年代后期才有莫里斯等人的发扬光大。赵元任虽然从哈佛任教归来,却不知道这两个词,因此在此文中说,他提议的“符号学”,可译为英文词 *symbolics*、*symbology* 或 *symbolology*^{[1](P177)},由此可见,赵元任是独立地提出这门学科的。

实际上符号学还有好几位独立提创者。在20世纪初,有维尔比夫人(Victoria Lady Welby)提出 *sensifics*;奥格登(C. K. Ogden)与瑞恰慈在1922年《意义之意义》(*The Meaning of Meaning*)一书中提出的 *Science of Symbolism*;图像学家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在1924年提出的“符号形式论”(Perspectives of Symbolic Form),以及德国哲学家卡西尔(Ernst Cassirer)在他的三卷本巨著《符号形式哲学》(*Philosophy of Symbolic Form*, 1923-1929年)提出的符号体系(称为 *Symbolism*),他的学说在他的女弟子苏珊·朗格(Susanne Langer)的符号美学那里得到发扬光大。

一般符号学史著作,没有把他们算进来,因为他们大多数人是用 *symbolism* 一词作为学科名称。其实 *sign* 与 *symbol* 在许多情况下(如在瑞恰慈、潘诺夫斯基、卡西尔笔下)同义,所有这些都是“符号学”的同义异体词,因为它们都是研究意义

的学说。符号被认为是携带着意义的感知,符号是用来传达意义的,意义必须由符号来承载,才能表达、传播、解释。因此符号学就是意义学。

在《意义学》中,李安宅就把三套命名体系结合起来。他说,他讨论的“意义学”,是 Study of Meaning,书中也称为 symbolism、semasiology。这最后一词来自希腊文 semaino(“意为”“意思为”),与上面提到的索绪尔用的“符号学”semiotique 以及皮尔斯用的 semiotics 同出一源,实际上是同源同义词。用 semasiology(符号学、语义学),这看来不会是他自己提出的,而是瑞恰慈的建议,虽然我没有查出来瑞恰慈的巨量著作中用过此词。冯友兰先生为李安宅此书所做的序中说“意义学是吕嘉慈所提倡的学问”^{[2](P9)}。这是一个旁证:瑞恰慈认为他们在研究的 symbolism,就是“符号学”。

瑞恰慈本人在《意义之意义》一书中,高度赞扬了皮尔斯的符号学意义理论。当时国际学术界尚未成形,学术交流相当困难,与今日的网络世界不可同日而语。作为剑桥著名学者,掌握的各种语言的学术资料都比较多,瑞恰慈与奥格登可能处于世界学术的中心地位,眼界最为开阔,对同代学者的理论广为涉猎。《意义之意义》一书的“附章 D”,花很大篇幅专章详论胡塞尔、罗素、弗雷格、皮尔斯等人。英美学界当时尚不熟悉的胡塞尔,被他们称为“研究符号问题最有名的现代思想家”;已经去世的测量局职员皮尔斯,也被称为“最复杂最坚决地处理符号及其意义问题”的学者;他们也承认索绪尔在法国影响正在扩大,虽然他们对索绪尔评价不高。

李安宅这本书的内容相当分明:绪论部分讨论现代符号学借以立足的“意义三角”,然后每一部分介绍一个人的理论,分别是皮亚杰(Jean Piaget,李安宅译为“皮阿什”,或许更准一些)的儿童意义能力发展过程理论,语言学的意义理论,瑞恰慈的意义理论,“信仰”的意义讨论。其中引用了不少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Kaspar Malinowsky,李安宅译为“马林儒斯基”)以及弗雷泽(James Frazer,李安宅译为“傅雷兹尔”)的《金枝》。所有这些论述,基本上是围绕着一个人类学者讨论意义问题的需

要展开的,其中介绍最详细的皮亚杰的发展心理学,不仅对人类学非常有用,在 20 世纪 60 年代也成为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支柱之一,李安宅置大篇幅于此,可谓独具只眼。从今天的眼光看,此书的主体部分介绍多于分析。但是在符号意义理论研究初创时期,这样介绍多人思想的著作,难能可贵。

李安宅这本书最令人感兴趣的,是不断引用中国哲学典籍,以及生动的中国诗词,来说明一些当时的中国学子可能觉得难懂的问题。此书第一章讨论“意义三角”,就引用道家 and 佛家的意象理论,来说明符号的功能。他指出道家的“非可道”,与禅宗的“不可说”看法都是对的。对于意义而言,在“没有更精的符号”时,任何符号都是无奈采用,却又无此不可的工具:“思想不可传达,无法记录,于是用语言文字作为符号。”^{[2](P6)}因为“思想是一回事,所思是一回事,所籍以思又是一回事,所籍以表思的是符号”^{[2](P48)}。这是对符号功能相当精确的描述。但是采用符号承载意义,这一步形成了真正的人类社会。李安宅引用马林诺夫斯基的看法,认为这个意义三角,“是文明社会才有的现象”。卡西尔说“人是使用符号的动物”;马林诺夫斯基进一步推论为“文明人是使用符号时言-物-意三分的产物”。如果没有文明实际上不能算人类,那么李安宅转述的马林诺夫斯基的说法,应当更准确。

李安宅引用中国典籍,妙处令人拍案称奇。例如在解答符号对意义之必须时,李安宅引用《汉书·艺文志》所列老子弟子文子的话“道五行无声,圣人强为之形,以一字为一言”^{[2](P46)}。“圣人”为了社群“强为之”,强迫给“道”一个形态,因此“一字一言”是社会规约的产物。再例如在说明“类推比喻”(analogical metaphor)时,李安宅引用《孟子》所载的孟子与告子的辩论“性犹杞柳也,义犹桮棬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棬”^{[2](P40)}。《意义学》用这种方式,非常生动地引导读者如何理解这些附在问题。

但是李安宅绝非泥古不化之辈。他不留情面地指责把文字当做圣旨、当做符篆,“就是不当做符号”的各种古人看法。他指责某些经学家以文本发送者的“原意”为意义时,引了曾巩

的诗句“况排千年非，独抱六经意”。他批评曾巩的看法是意义源头迷信“在一般好古之士看来，恐怕还是《六经》本身就是《六经意》，用不着有个《六经》再有个《六经》所传达的或《六经》所被解释的意义。”^{[2](P47)}

用这种方式，他就把意义落实到解释中来，这也就是现代符号学的基本观念：解释意义，而不是发出者意义或文本“本有”的意义，才是最根本“实例化”的意义。说到底，意义就是对符号的解释。李安宅引用《新序》“向也见客之容，今也见客之意”^{[2](P54)}。意义处于符号表现体之未来，“以容为容”是见到符号的再现体，然后才能对此做出解释。鉴于此，他举出一连串古人诗句，作为从感知到解释的意义实现例证，十分生动。

由此，李安宅最后得出的“意义”定义，虽然是瑞恰慈与奥格登书中所述，但是作为这一章的押尾之笔，可见出李安宅的态度“解释符号的人相信‘用符号’的人所指的东西。不但说出自己如何解释，而且相信的就是原著所有的意义。”^{[2](P60)}李安宅书的主要贡献，也是精彩之处，就是用中国典籍说明这问题。他引《公羊传》的“西狩获麟传疏”对《左传》此语的讨论“麟之由来，应于三义：一为周亡之征，二为汉兴之端，三则见孔子将没之征：故曰‘吾道穷矣’。”李安宅此论不一定是孔子原意，而是“做疏的人替孔子做注解……认为孔子在说这话时候含着这三种意义”。^{[2](P58)}如此例子，可以令中国读书人信服意义的“解释定义”。“解经学”本来就是现代阐释学的起端，这个意义定义，实际上就是20世纪符号学与阐释学殊途同归的意义的定义。

此书在1934年出版之后，李安宅得到罗兹奖学金(Rhodes Scholarship)西渡留学，在伯克利加州大学与耶鲁攻读人类学。1937年抗战伊始，他回国担任“边疆巡视员”，也是用其所学。1941年他到成都，在现四川大学的前身华西协合大学任教，担任社会学系主任。这所大学是华西协合大学(四川大学前身之一)与撤退到后方的四所教会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燕京大学)在成都华西坝联合办的学校，史称“五大学”(The Big

Five)，与云南的西南联合大学遥相呼应。该校人才济济，极一时之盛，陈寅恪、吴宓、顾颉刚、钱穆等大师均来此任教。李安宅原本是燕京大学的学生与教师，此时欣然加入，在“五大学”创办了“华西边疆研究所”，其时其地，人类学正切合时代需要。英国学者燕卜森曾经回忆道：战时办学，诸多不易，但教师学生，民气可用，学习主动性很高。尤其是做人类学的学者，到了最佳研究地，特别兴奋。当时四川突发霍乱瘟疫，“五大学”学生组织“服务团”深入乡村开展救助。

抗战胜利后，1947年李安宅再度受邀赴美担任耶鲁大学客座教授。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回国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由于他丰富的藏学素养，他加入进军西藏的参谋团。进藏后，于1950年到1956年，躬身实践创办“拉萨小学”，经营多年，为藏区的现代教育做出了重大贡献。1956年他回到成都，参与创办西南民族学院。1963年到四川师范学院任外语系教授，直到1985年去世。

李安宅以他的社会人类学成就鸣于世，他精通英语、藏语、俄语(20世纪20年代中期曾由李大钊介绍为张家口苏联领事馆作翻译)，懂德语、日语、西班牙语。从他的著作中也能看出他的国学修养，他博闻强记，善于用中国传统文献来讲透问题。更重要的是他博览群书，勤于写作，给我们留下许多宝贵的学术遗产。可惜的只是，他没有能在意义理论上追索下去，没有能开中国符号学运动的先河。赵元任只是给我们留下了这个学问的名称与轮廓，李安宅只是给我们留下了符号意义问题的相关讨论，但二者都后继无人，留下的种子只能在现代史的洪流中淹没。中国学界在80年代重新开始符号学运动时，无人知道他们的贡献，现在我们发掘出来，就明白了这个学说在中国的历史并非空白。现在我们纪念先驱者，也是为了明白我们自己的生世。

从今天的眼光看，《意义学》这本书当然不是没有缺点的。主要是缺乏整合：皮亚杰的思想，马林诺夫斯基的思想，瑞恰慈与奥格登的思想，虽然都是在讨论意义问题，却分章阐述，没有归入一个合一的、论辩自圆其说的体系。因此李安宅先生后来一直称此书为“译述”，而非

“著述”。他对中国意义理论文献的广博深厚认识，也没有能从中归结、引导出一个中国的独立的符号意义学体系。虽然如此，这本讨论符号意义问题的《意义学》，却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唯一的一本符号学著作，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一批符号学著作出现之前，这是一个孤例。为此，此书难能可贵，值得学术史家珍视，也值得今日

学子重读。

（鸣谢：本文的写作得到了四川师范大学王川副校长的支持，许多李安宅生平材料来自他编的《〈李安宅自传〉的整理与研究》一书，中国藏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参考文献：

[1] 赵元任. 赵元任语言文学论集 [M]. 吴宗济, 赵新那编,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2] 李安宅. 意义学 [M]. 北平: 商务印书馆, 1934.

Li Anzhai and the First Book on Semiotics in China *A Theory of Meaning*

ZHAO Yiheng

(The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China)

Abstract: Li Anzhai (1900 – 1985), a native of Qianxi, Hebei Province, was a pioneer of Chinese semiotics. He taught in the Sociology Department of Yenching University in his youth. He was also the pioneer of Chinese anthropology and one of the founders of Tibetan studies. In 1930, British scholar Ivor Armstrong Richards (1893 – 1979) came to teach and make research on Mencius in Tsinghua University and Yenching University. Li participated as assistant together with Fei Xiaotong (1910 – 2005), wherein he came into contact with the study of semiotics in Europe and wrote the book *A Theory of Meaning* (*Yiyixue*). This is the only semiotic work in China before 1980s, which has important historical value.

Key words: Li Anzhai; *A Theory of Meaning* (*Yiyixue*); semiotics

责任编辑 刘德兴